

# 网络政治传播中的议题建构与互动 ——基于4个时政型事件的框架分析

贾哲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191)

**摘要:** 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的分化是中国网络政治传播生态显著的特点。通过选取4个时政型网络事件,使用内容分析方法并结合框架理论,对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在议题建构中所使用的6项通用框架(事实认定、冲突、责任归因、对策建议、道德判断与人情味)与3项主题框架(政治行为、政治评价、政治发展)进行了量化分析。结论显示,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在框架使用中存在多层次的差异性,公众场域往往能够在事实层面影响官方场域,具有向官方场域输入议程的能力,而在行动层面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关键词:** 网络政治传播; 官方场域; 公众场域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4)06-0136-07

## 一、网络政治传播的双重场域

网络政治传播的发展遵循两种路径,一是政府利用互联网传播形式,回应社会公众的政治诉求并进行有效沟通;二是公众通过网络工具获得话语权与参与权,在网络公共领域参与政治传播过程。路径差异导致传播场域分化,已有研究认为中国目前的网络舆论生态发生显著变化,核心是存在两个明显独立但交错的“双重话语空间”,官方话语空间与非官方即民间话语空间<sup>[1]</sup>。延续这种思路,中国网络政治传播的一个核心现状是存在官方与公众两个传播场域。

官方网络政治传播场域(简称官方场域)由政治权力所掌控的一系列传播关系构成,基本形态是政党、政府、受政府监管的大众媒体通过政府网站、主流媒体新闻网站、官方背景的商业网站、社交媒

体等,发布各类公告、政策、会议、新闻报道、专题评论。公众网络政治传播场域(简称公众场域)由非官方的话语体系构成,主要参与力量即网民及网络群体以微博、社交网站、即时通讯、论坛、移动互联网社交工具等为阵地,产制并传播各类信息,如评论、博客、微博等。网络政治传播中行为与关系的基本呈现形式是议题建构与话语互动。

## 二、内容分析研究设计

确定“宜黄拆迁事件”“乌坎事件”“什邡事件”“表叔事件”等4个时政型网络事件为案例(如表1所示)。标准为事件既缘起于网络,又涉及政府、政策、政治权力、公民权利、政治抗争等议题,且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入选当年的人民网舆情监测频道“年度网络舆情事件排行榜”。

表1 4个时政型网络事件的基本情况

名称	事件简述	涉及问题
宜黄拆迁(2010年)	江西省宜黄县发生一起因拆迁引起自焚事件,经过“微博直播”而扩大网络舆论影响力,有关部门与领导被追责。	利益诉求、个人抗争、政府行为
乌坎(2011年)	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民因多年累积的土地、财务、选举等问题非正常上访并引发群体事件,网上与网下联动,引起高层关注并采取措施。	利益诉求、群体抗争、基层政治、政治合法性
什邡(2012年)	什邡公众反对政府“钼铜项目”建立而进行的抗议活动,网络工具起到了重要的传播、组织、扩散作用,民意影响了政府决策。	公共政策意见输入、集体动员、政策影响力
表叔(2012年)	陕西一起重大事故处理过程中“局长杨达才微笑”引来网友不满,网友以其所佩戴的手表为线索展开人肉搜索。舆论引发关注,有关部门展开调查。	揭露监督、官员行为、网络反腐、廉政建设

### (一)分析框架

框架是属于个人的“解释的图式”,即人们用来

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

收稿日期: 2014-07-15

作者简介: 贾哲敏(1985—),女,博士,讲师,E-mail:minminjzm@126.com

多的具体事实<sup>[2]</sup>。通过这种结构式的图景,人们发现、了解、认识与区分事件,将日常生活的现实纳入框架之中。吉特林(Gitlin)认为框架就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他把框架和新闻生产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框架理论从原来只是关注个体如何依赖于自己的认识图式来理解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转而应用到媒介和传播研究中来。恩特曼(Entman)认为新闻传播领域的框架构建具体指这样一种过程:“人们选择感知事实的某些部分,并将它们凸显在传播的文本中,通过这种方式传达关于被描述对象的某种问题的定义、因果解释、道德判断以及处理建议”<sup>[3]51-58</sup>。框架理论为分析纷繁复杂的网络政治传播文本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持,无论政府、媒体还是社会公众,在报道、讨论时政型网络事件的过程中,都会遵循一定的框架,而对这些框架进行分析便可以了解不同的主体如何建构社会现实,“框架能够分析人们如何遵循话语或叙事建构的某些具体规则展开交往行动,从而实现在具体行动场景下对情境的共同定义,建构现实话语或叙事活动表现为话语的斗争,即讨论与辩论,框架分析要考察这个斗争的过程,公共领域发生的话语斗争,是民主社会中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sup>[4]</sup>。

最常用的框架是恩特曼提出的4种议题通用框架:问题界定、原因分析、道德判断、解决方案<sup>[5]51-58</sup>。茂伊与周(Moy&Zhou)用这个框架分析了2005年“宝马撞人案”之后网络讨论对媒体框架设定的影响<sup>[5]</sup>,尹连根补充了“法理分析”框架,分析了网络媒体与网下传统媒体的框架关系,认为“网下传统媒体不仅仅在提供意见,而且在提供事实方面都比网上媒体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地位”<sup>[6]25-31</sup>。斯密特克与瓦尔肯堡(Semetko&Valkendurg)通过对欧洲政治议题的研究,总结出了媒体对欧洲政治议题报道采用的5种框架:冲突框架、人情味框架、经济后果框架、道德判断框架、责任归因框架<sup>[7]</sup>。国内学者利用这5种框架分析了新华社与美联社对全球变暖风险这一议题的媒介建构<sup>[8]</sup>,还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调整使用5种框架研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节目<sup>[9]</sup>。瓦雷泽(Vreese)区分了具体问题框架与通用框架,具体问题框架与具体议题、事件相关而通用框架则是能够超越主题的限制,在不同议题与背景中存在的框架<sup>[10]</sup>。国内学者研究贪腐新闻所使用的媒介框架则进一步分为中层结构(包括界定问题、原因分

析、道德判断、支持的解决方案)和高层结构(报道周期、报道长度、版面、连续报道量)<sup>[11]</sup>。

对于官方网络政治传播场域而言,话语建构依托于媒介新闻框架,对于公众网络政治传播场域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看待,一是针对媒介框架而产生的受众框架,二是源于公众自主知识与观念而形成的表达框架。本文将“4种框架”与“5种框架”结合起来,使用事实认定、冲突、责任归因、对策建议、道德判断、人情味6项作为通用框架。通过对时政事件的主题分析,明确新闻或讨论中主要存在3种政治主题:政治行为、政治评价、政治发展,从而得出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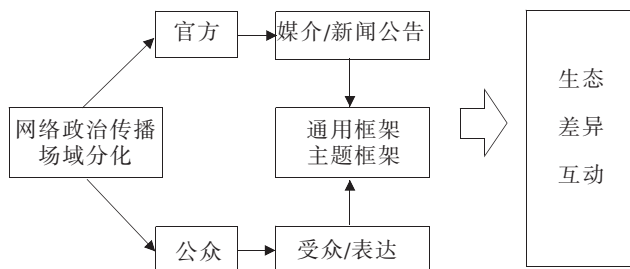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示意图

## (二) 样本选择

选取人民网与新华网作为官方场域的代表,利用搜索引擎建立抽样框(使用人民网、新华网站内嵌的搜索工具,并辅助以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确定关键词、时间范围<sup>①</sup>,按时间排序显示所有结果后剔除相似新闻、不相关新闻、视频新闻,同一篇报道转载按时间顺序保留最先刊发的一篇,得出样本共计160篇。“新浪微博”作为公众场域的代表,使用新浪微博内部的搜索工具,对原创微博进行系统抽样,每个事件保留200条微博,共800条,对微博逐条细读后删除与议题不相干的微博,共保留有效微博732条。

## (三) 类目建构

官方场域的分析单元为单篇消息、报道、评论,公众场域则为一条独立的微博。通用框架中,事实认定主要陈述事件的发生、发展,并依据新闻来源分为官方、民间两个视角;冲突框架为说明在事件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争议,主要有事实性争议与态度性争议两种;责任归因框架强调事件发生的责任归属,分为归责于政府、归责于个人或群体、归责于制度3个视角;道德判断框架是用伦理道德、社会规范、文化规范对事件进行判断;对策建议则定义为对事件做出行动、观念、决策等方面的回应,分为政

①4个事件的关键词与搜索时间段分别为:宜黄拆迁事件:“宜黄拆迁”2010.09.10—2010.10.12;广东乌坎事件:“乌坎”2011.09.21—2012.01.10;什邡事件:“什邡事件”2012.06.30—2012.07.09;表叔杨达才案:“杨达才”2012.08.26—2012.09.21。默认关键词出现在标题之中。

府、社会、个人、制度4个层面;人情味框架则表现为文本中使用人性化、感性化的手法,重视细节描述并体现个人情感。政治主题框架之中,政治行为是政府或其相关人员、机构在事件中实际进行的具体活动;政治评价指针对政府行动及行动后果给出的评论、反思与情感表达等;政治发展则指文本的核心主题涉及政治制度分析、政策意见、改革发展等深层次议题。最后,类目还包括了分析单元的基本信息,并将事件划分为初始、发作、蔓延、结束4个阶段。

#### (四)编码与信度检测

所有样本的编码由两名编码员按照编码表完成。编码员阅读文本并独立判断文本是否明显使用某一通用框架与政治主题框架,使用某一框架则编码为1,没有使用则编码为0,并同时判断文本集中突出哪种视角,根据编码表记录主视角为1,其余为0。研究使用30篇官方传播场域中的文本、100条公

众传播场域中的微博检测了Scott's Pi(斯科特信度系数),两位编码员对两个场域文本的通用框架判别系数为:官方场域事实认定(1.0)、冲突(0.72)、责任归因(0.97)、对策建议(0.95)、道德判断(0.85)、人情味(0.92),信度较好;公众场域由于文本表达随意,欠缺规范性,故而系数较低,但经过对编码员的再培训,信度系数满足了进一步分析的要求,分别为事实认定(0.93)、冲突(0.70)、责任归因(0.82)、对策建议(0.75)、道德判断(0.82)、人情味(0.73)。研究使用了SPSS18.0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三、数据分析

#### (一)议题框架建构与差异

##### 1. 通用框架分析

表2显示的是两个场域在4个事件中使用不同框架的频次分布以及交互关系。

表2 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在议题中的框架建构及差异

框架名称	官方 (N=160)	公众 (N=732)	Pearson 卡方值	显著性
事实认定	146(91.3%)	436(59.6%)	58.140	0.000
官方	110(75.3%)	182(41.7%)	114.849	0.000
非官方	36(24.7%)	254(58.3%)	7.829	0.005
冲突框架	61(38.1%)	342(46.7%)	3.917	0.048
事实	48(78.7%)	214(62.6%)	0.037	0.847
态度	13(21.3%)	128(37.4%)	7.459	0.006
责任归因	125(78.1%)	459(62.7%)	13.810	0.000
政府	54(43.2%)	329(71.7%)	6.717	0.010
个人	39(31.2%)	51(11.1%)	43.860	0.000
制度	32(25.6%)	79(17.2%)	7.116	0.000
对策建议	120(75%)	406(55.5%)	20.710	0.000
政府	81(67.5%)	222(54.7%)	24.361	0.000
社会	5(0.04%)	31(0.08%)	0.641	0.726
当事人	2(0.02%)	3(0.03%)	3.021	0.221
改革	32(27%)	150(36.9%)	0.231	0.891
道德判断	54(33.8%)	392(53.6%)	20.594	0.000
人情味	62(38.8%)	362(49.5%)	6.032	0.014

在官方场域的数据分析结果中,有91.3%的文本采用了事实认定框架,且主视角是官方性(75.3%),而使用非官方来源消息的比例偏低(24.7%),这说明政府及主流媒体通常直接通过官方的事实认定、数字通报、情况描述等方式,将事件发生的始末向公众通报。公众场域使用事实认定框架的比例远远小于官方,仅有59.6%,且主视角以非官方为主(58.3%),从某种程度说明公众更愿意转发源于民间的关于事实认定的消息或者自主对事件进行描述。官方场域有38.1%的文本使用冲突框架,其中事实性冲突占78.7%,说明官方场域并不回避公众与政府在事件关键问题上的争议性,但对于态度方面的冲突则显得

较为谨慎。46.7%的公众场域文本表现出对冲突的关注,这一比例要高于官方场域,可见公众更关注事件中的“争议性”,凸显了公众对官方应对事件过程中的多重不信任。

官方场域中有78.1%的文本使用责任归因框架,主要有两种策略,一是直接通报查处事故责任人;二是针对事件发表有关责任归属的分析与评论。从视角的层面,归责于政府的比例最高(43.2%),其次是归责于当事人(31.2%),归责于较为深层制度原因的比例最低(25.6%)。公众场域有62.7%的文本使用责任归因框架,是议题建构过程中使用最多的框架,且有71.7%的文本将责任归因



于政府,说明公众通常直接指出政府过失,并认为政府或官员应承担全部责任。官方场域对对策建议框架的使用也较为突出(75%),视角集中在“政府行动”(67.5%),其次是呼吁相应的改革(25%)。公众场域则有55.5%的文本采用对策建议框架,认为政府应采取行动的占54.7%,其次是认为应当进行改革,占36.9%,这一比重明显高于官方场域中认为应当进行改革的比重。

道德判断是一项主观性较强的框架,公众场域

使用的比例(53.6%)远远高于官方场域(33.8%)。最后,官方场域使用人情味框架的比例为38.8%,说明政府与主流媒体已经重视将政治议题的部分细节做人性化处理。民间表达是一种未经专业训练的表达,公众更容易从感性的视角来建构、描述议题,这使得公众场域人情味框架的使用更为明显(49.5%)。

## 2. 框架相关性

表3显示了经过Spearman检验后两个场域所体现出的框架间相关性。

表3 议题框架间相关分析

框架	官方					
	事实认定	冲突框架	责任归因	对策建议	道德判断	人情味
事实认定	1	0.076 0.035	-0.057 -0.089*	-0.179** -0.184**	-0.013 -0.287**	-0.300 -0.220
冲突框架	—	1	0.135** 0.139**	0.022 0.106**	0.283** 0.213*	0.311** 0.226**
责任归因	—	—	1	0.393** 0.446**	-0.026 -0.010	-0.046 -0.091*
对策建议	—	—	—	1	-0.107 -0.008	-0.052 0.115**
道德判断	—	—	—	—	1	0.501** 0.412**
人情味	—	—	—	—	—	1

注:\*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两个场域相关性最强的框架较为一致,即“责任归因与对策建议”(0.393/0.446)以及“道德判断与人情味”(0.501/0.412)。这说明无论官方还是公众,追责与对策往往同时出现,基本的逻辑过程是“追究责任归属,进而寻求解决策略”。道德判断与人情味同属于主观性强、情感性、人性化较为突出的框架,因此关联性强。这说明对事件的道德判断通常基于细节性描述,人情味框架描述、形容的越充分,引起道德判断的可能性就越强。另外可以看到,在公众场域中“道德判断与事实认定”之间存在相关(-0.287),但官方场域却没有相关性,这说明公众容易对事件进行道德判断,且这种判断从事件发生就会一直存在,而官方在事实认定的过程中不会轻易进行道德判断。表3说明公众场域框架之间弱相关性较多,由于民间表达存在自由、非专业、情绪性强等特点,使得公众场域的框架间关联更为复杂。

## 3. 政治主题中的框架呈现

主题框架是议题建构过程中“高屋建瓴”的部分,能够从宏观上把握两个传播场域对政治议题主旨的涉猎。数据显示,官方场域主要集中在政府行为这一主题(60.6%),然后是政治发展主题(26.3%),

关于政治评价主题的最少(13.1%),而公众场域则集中在政治评价主题(41.7%)和政治行为主题(40.1%),对于政治发展主题涉及最少(17.3%)。通过一元方差分析(ANOVA),表4显示了两个场域的6项框架在不同政治主题中的差异。

官方场域中,冲突、道德判断、人情味框架在不同的主题中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3个框架受政治主题的影响较小,而事实认定框架(均值为0.96)更容易出现在政治行为主题中,责任归因框架(均值为1.0)与对策建议框架(均值为0.97)更容易出现在政治发展的主题中。公众场域中除冲突框架外,其余均为显著。具体而言,公众场域中事实认定框架(均值为0.76)更容易出现在政治行为主题中;责任归因框架(均值为0.86)则更容易出现政治发展主题中,这与官方场域是一致的。最容易出现道德判断框架(均值为0.60)与人情味(均值为0.45)的是政治评价主题,这一点与官方场域不同。

## (二) 议题框架的互动关系

### 1. 事件不同阶段的框架间互动过程

“互动过程”需要考虑事件发生的不同阶段。有学者将事件注意周期分为前期阶段、预警阶段、反思

表4 通用框架在政治性议题中的一元方差

框架名称	政治行为 均值/标准差		政治评价 均值/标准差		政治发展 均值/标准差		F 值		显著性	
	官方	公众	官方	公众	官方	公众	官方	公众	官方	公众
事实认定	0.96(0.17)	0.76(0.42)	0.90(0.30)	0.54(0.49)	0.78(0.41)	0.33(0.47)	6.572	42.116	0.000	0.000
冲突	0.37(0.48)	0.47(0.50)	0.25(0.46)	0.48(0.50)	0.45(0.50)	0.41(0.49)	0.371	0.789	0.521	0.455
责任归因	0.69(0.46)	0.53(0.49)	0.76(0.43)	0.62(0.48)	1.0(0.0)	0.86(0.34)	9.000	22.832	0.000	0.000
对策建议	0.61(0.48)	0.41(0.49)	0.90(0.30)	0.55(0.49)	0.97(0.15)	0.88(0.31)	13.233	45.277	0.000	0.000
道德判断	0.30(0.46)	0.45(0.49)	0.38(0.49)	0.60(0.48)	0.38(0.49)	0.56(0.49)	0.433	7.892	0.649	0.000
人情味	0.36(0.48)	0.37(0.48)	0.42(0.50)	0.45(0.49)	0.40(0.49)	0.22(0.42)	0.231	10.521	0.794	0.000

表5 不同阶段中双重场域使用框架的相关关系(1)

框架名称	初始阶段 系数/显著性	发作阶段 系数/显著性	蔓延阶段 系数/显著性	结束阶段 系数/显著性
事实认定	0.389*(-0.001)	-0.055(0.063)	-0.046(0.119)	-0.104**(0.000)
冲突框架	-0.021(0.478)	-0.040(0.171)	-0.055(0.061)	-0.047(0.109)
责任归因	-0.200(0.500)	-0.048(0.101)	-0.218**(0.000)	-0.209**(0.000)
对策建议	-0.015(0.608)	-0.041(0.163)	-0.109**(0.000)	-0.211**(0.000)
道德判断	-0.022(0.449)	-0.036(0.224)	-0.053(0.070)	-0.050(0.090)
人情味	-0.018(0.542)	-0.027(0.361)	-0.050(0.089)	-0.041(0.165)

成本阶段、公众兴趣下降阶段、问题后期阶段<sup>[2]</sup>,或结合中国实际将“政府介入”作为关键点将事件分为“前政府介入期、政府介入期、后政府介入期”<sup>[6]25-31</sup>。为了分析在历时过程中两个场域使用框架的互动关系,将事件划分为初始、发作、蔓延、结束4个阶段。

表5展示了事件不同阶段,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框架间的相关性。事实认定框架体现出的是,在事件发生初始,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相关性较强(0.389),说明两个场域之间产生了相互影响,在发作与蔓延的

过程中则没有明显的相关,而在结束的过程中,两个场域也体现出了弱相关(-0.104)。责任归因与对策建议框架在初始、发作两个阶段均不相关,而在蔓延与结束过程中有较弱的相关,说明两个场域有着有限的相互影响(-0.218 /-0.209;-0.109/-0.211),而冲突框架、道德判断、人情味框架在事件全过程都不相关。

研究进一步对两个场域在不同阶段显著相关的3个框架(事实认定、责任归因与对策建议)进行了事件阶段重组,相关关系如表6所示。

表6 不同阶段中双重场域使用框架的相关关系(2)

框架名称	阶段关系	系数/显著性
事实认定	官方初始 VS 公众发作	-0.029(0.324)
	官方发作 VS 公众蔓延	-0.186**(0.003)
	官方蔓延 VS 公众结束	-0.038(0.203)
	公众初始 VS 官方发作	-0.261**(0.000)
	公众发作 VS 官方蔓延	-0.029(0.324)
	公众蔓延 VS 官方结束	-0.127**(0.000)
责任归因	官方初始 VS 公众发作	-0.021(0.471)
	官方发作 VS 公众蔓延	-0.074(0.012)
	官方蔓延 VS 公众结束	-0.201**(0.001)
	公众初始 VS 官方发作	-0.046(0.120)
	公众发作 VS 官方蔓延	-0.177**(0.009)
	公众蔓延 VS 官方结束	-0.227**(0.000)
对策建议	官方初始 VS 公众发作	-0.107(0.555)
	官方发作 VS 公众蔓延	-0.167**(0.023)
	官方蔓延 VS 公众结束	-0.096**(0.001)
	公众初始 VS 官方发作	-0.036(0.225)
	公众发作 VS 官方蔓延	-0.067(0.023)
	公众蔓延 VS 官方结束	-0.126**(0.000)

注:\*\*在0.01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事实认定框架中,官方发作与公众蔓延之间有着较为微弱的相关关系(-0.186),说明在事件开始清晰的过程中,官方的信息能够为公众设置议程并引导公众。公众初始与官方发作呈现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0.261),说明公众初始阶段的信息会影响到官方下一阶段的信息,公众具有了在事实构建方面向官方输入的可能性。公众独立认定事实的能力也会影响到官方对事件进一步调查的深度与广度,并影响官方话语,从而实现“反设置”。责任归因框架则在蔓延与结束的过程中显示出两个场域的相关性(-0.201;-0.227),说明在这两个阶段官方与公众场域都十分重视“责任”话语建构,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对策建议框架的时序相关性较为微弱(-0.167;-0.126),表明虽然公众场域在事件蔓延与结束阶段提及的“对策建议”能够被官方场域“感知”,但很难产生显著而直接的影响。

#### 四、研究发现与讨论

中国网络政治传播双重场域存在着议题建构的多层差异与有限互动。

##### (一)事实认定差异化及信息来源的多元化

事实认定是官方场域最为重视的框架,且信息来源以官方为主,但已经出现部分使用民间消息的情况。公众场域对事实认定框架的重视不及官方场域,消息大多来源于民间非正式渠道,因此是否使用“官方来源”进行事实认定成为两个场域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不可否认的是,在诸多政治议题事实认定的层面官方媒体依然呈现出较为统一的话语模式,然而官方场域的消息来源已不是“铁板一块”,社会化媒体不断在消息来源的供给控制中突围,官方场域采用网络消息、意见领袖观点等一系列非官方信息来源的文本也时有出现。另一方面,网络传播时代公众事实认定的能力加强,众多“在场”与“缺场”的网民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直接参与到事件事实的书写与传播之中。即使民间信息“未经证实”,或与官方数据有明显的出入,公众仍然更愿意相信民间信息。质疑政府“事实认定”,成为民众最常见的表达行动,这对官方场域传播的权威性、即时性与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 (二)迥异的责任归因逻辑

“责任归因”是公众场域构建议题使用最多的框架,在具体视角方面更为集中,都倾向于将事件责任归因于政府行为。“乌坎事件”“什邡事件”“表叔事件”等虽然起因、过程与性质不同,但公众通常会归因于政府职能缺失、行为失当或权力滥用。

公众对政府行为表现出不信任,印证了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官民矛盾,这种情况也容易导致民间意见极化。在研究中发现,无论政府是否及时追究行政责任,将责任人迅速处理,官方场域并不会回避“责任框架”的使用,而重视“客观归责”也成为官方场域话语的新突破,以应对网络时代网民对于事件责任的不懈追问。

##### (三)道德判断与人情味在公众场域的广泛使用

数据表明,公众场域使用道德判断的比例远远高于官方场域,印证了公众场域是社会情感宣泄的一个重要场所。长期以来官方媒体对于时政型事件的报道侧重“通报”,而公众话语对事件的建构却是从细节入手的,通过透彻的细节描写与情感铺陈来影响公众,“人情味”十足。公众场域中道德判断与人情味框架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且与事实认定、冲突框架也具有相关性,说明了这两个框架在公众场域议题建构之中具有普遍性,并通常伴随着政治评价。公众不仅在事件初始就使用道德判断框架形成情感攻势,一旦官方与公众对于事件建构的某一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形成了事实或者意见、态度方面的冲突,公众场域就会使用人情味的框架不断提供更多事实与细节,逐步推进道德审判,并形成强大的情绪舆论。

##### (四)事实认定层面的议程设置与反设置

在事实认定这一框架中,官方与公众的互动性最为显著,说明两个场域在通告事实、推动事态发展方面存在相互影响。官方和公众在事件初始阶段的相关性显著,这符合一个经验性的事实,即事件从民间兴起,双方各自进行信息采集与事实建构,公众的关注与讨论、对事件的阐释与传播会影响到官方场域,从而实现了公众议程对官方的反设置。随着官方通报事件并展开调查,这一过程成为民间讨论的重点,体现出官方议程对公众议程的设置。而从蔓延阶段到结束阶段,两个场域的影响是相互的。表现在官方对于相关问题“定性”并给出结论,公众的讨论会随之升温,如果出现瞒报、包庇、漏报或不公正的现象,公众则通过进一步的深入讨论、爆料、分析,形成舆论,反过来影响到官方场域,推动其对事件进行再调查、再通报。

##### (五)行动层面的有限互动关系

责任归因框架与对策建议框架的核心是公众向官方输入关于事件较为深入的意见(区别于事实层面),属于行动层面。在事件发作阶段,公众对于责任归因的讨论微弱影响到官方场域,说明公众在

事件早期就希望将他们认定的责任归属作为民意向政府输入,而对策建议一项却是官方微弱地影响民间,这体现出官方在事件早期提出的解决办法、处理方案会对公众的意见形成产生影响。在事件蔓延与结束过程中,官方与公众在上述两个框架中存在相互影响关系。结合之前的分析,公众将责任归于政府行为不当,这种舆论能够给政府施加影响,政府一般会回应这种诉求,同时官方场域也会加大对于责任与对策的框架建构。随着责任清晰并开始问责官员,官方场域的框架随之发生变化,也会进一步影响到公众场域。但总体上看,行动层面双方的互动关系没有事实层面的显著。

## 五、结论

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在议题框架建构方面所表现出的多层差异性,是目前中国网络政治传播的一个基本特征,还可以视作网络政治传播关系形成的重要驱动力。互联网赋予公众更多的话语权与参与权,公众场域在“关注什么”这一层面具备了“反设置”能力,能够影响到政府议程。行动层面两个场域的“有限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网络舆论作为意见输入机制的机会与困境,涉及到更多行动过程,并与政治制度紧密相关。

### 参考文献:

- [1] 何舟. 中国政治传播的路向[J]. 新闻大学, 2008(2): 34-36
- [2] 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 New York: Harper&Row, 1974: 21.
- [3] Entman R M.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 43(4): 51-58.
- [4] Pan Z, Kosicki G M.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93, 10(1): 55-75.
- [5] Zhou Y, Moy P. Parsing framing process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media coverage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 57(1): 79-98.
- [6] 尹连根. 邓玉娇案的框架分析: 网下公共舆论如何影响网上媒体报道[J]. 国际新闻界, 2011(12): 25-31.
- [7] Semetko H A, Valkenburg P M. Framing European politic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0, 50(2): 93-109.
- [8] 陈潇潇. 全球变暖风险的国际媒介建构: 以中美通讯社报道为例[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0.
- [9] 王秀丽. 新闻调查 1996—2005: 一种框架分析[J]. 国际新闻界, 2011(12): 78-84.
- [10] Vreese C H. News framing: theory and typology[J]. Information design journal document design, 2005, 13(1): 51-62.
- [11] 李东晓. 居间政治: 中国媒体反腐的社会学考察[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139.
- [12] Downs A. Up and down with ecology: the issue attention cycle[J]. Public interest, 1972, 28(1): 38-50.

# Study on Agenda Building and Discourse Interaction of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 —Framing Analysis on Four Political Internet Events

JIA Zhem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Dual communication spaces, both official and public,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s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and frame theory, the research chooses four political internet events, trying to test six general frames (fact frame; conflict frame; responsibility frame; suggestion frame; morality frame and human interest frame) and three theme frames (political behavior; political judge;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uncovers multiple differences and limited interactions when both spaces frame themselves in political issues. Especially in factual level, public space is capable to construct their own words and frames, which also can set the agenda to official space. In action level, it only finds out comparatively limi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two spaces.

**Key words:**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fficial spaces; private spaces

[责任编辑: 箫姚]